

淺談「服務教育」的政治經濟學： 組織內的勞動、社會的服務與自我 的社會存在

通識教育中心

副教授兼學務處服務教育組組長

王崇名

我到本校服務已經快滿兩年了，剛到學校的時候常聽到老師與學生給學校的許多建議，聽多了不禁覺得自己是不是該繼續待下去！這樣的學校到底有沒有發展？結果與我同期到校服務的幾位老師，快者半年，慢者一年先後轉到他校服務。我的主要研究領域是社會學理論與法律社會學，只要一張桌子，一部電腦，就可以作研究了，如果可以再提供一間安靜的研究室，就很完美了。不過目前就學校的空間條件而言，不敢奢求。學校待了一陣子也適應了，可以在吵雜聲中作一些理論思考的工作。

雖然是適應了，但是我還是一直自忖著：這個學校如果像大家所說的那樣，為何這個學校還能生存下去？而且師生皆敦厚樸實，研究水平也不差，有些相當優秀的老師這一輩子算是都奉獻給學校了。於是我便試著從學校經營者的角度來想像這個學校，暫時忘記那種常自以為是的「教授心態」。

東海大學畢業的學生最懷念母校的地方，就是那種既自然又充滿人文氣息的环境，我離開東海大學剛到本校服務的時候，坦

白說並不習慣學校的「小」。有幾回晚一點下班在學校漫步，不再那麼行色匆匆，仔細品味學校的環境，開始感覺出他儉樸的韻味，有時還看到衣著素雅的董事長與夫人，特別是董事長有時還從醫院坐著工友開的運輸車到學校，我佇足良久思索。其實本校在各校毫無成本與風險觀念，不斷恣意擴張下，猶能如此克儉發展，實不簡單。我們在批評學校與羨慕他校時，似乎忽略學校經營的困難：風險與成本的壓力。

這是一個講求權利請求的時代，我在課堂上也鼓勵學生要勇於迎接這樣的時代，這是中國千年來大突破的契機。但是我也不忘叮嚀權利請求的基礎是義務，這兩者是相形相剋。如果現代西方社會成就出某些社會正義，他的基礎正是兩者的相互穿透且平衡。不過權利請求與盡義務，並不是口號喊喊就好。

有一回我在福華飯店附近的十字路口看到一位「黃頭髮的老年人」。在一家雙語幼稚園前掃馬路，並把路旁over-leaves的垃圾堆好。因為這位老先生的頭髮太特別，而且正午時刻在掃馬路，引起我的好奇心，便趨前看去。結果他是一位年輕的老外，正是那家雙語幼稚園的老師。看到這樣的社會景緻，我的腦海不禁翻閱著彼得·杜拉克的作品：《巨變時代的管理》。該書寫道：現在美國中產階級每週平均花二到三個小時從事志願服務。這些中產階級當年是反越戰與嬉皮主義的中堅份子，十足的個人主義，高喊著個人的權利高於社區與國家的利益，如今卻十分認同社區與社會服務。我們不禁會問：他們到底是怎樣的一群人，美國到底是怎樣的社會？我想這是大哉問！很難在此三言兩語道盡，我只想點出這個問題讓大家想想，以下也試著作簡單的回答。

在十五到二十年前的美國管理階層都想著所待的組織能給他

甚麼福利，現在卻問：我如何能經由組織交付的工作，體驗他的存在價值？美國人對於勞動價值的轉換，使他們的全國總競爭力提升了，重新奪回世界經濟霸權的盟主。其實美國人並沒多大的改變，他們還是很個人主義，他們為組織奉獻的目的還是為了自己，並沒有那種犧牲小我完成大我的神聖化價值觀。

美國企業組織本身的組織方式改變了，傳統的企業組織是科學化的組織，一切強調形式規章的管理，以便降低市場購買勞務與財貨的成本。同時人力本身作為一種專業資本的時機也尚未成熟，也就是「人力資本」的觀念還在醞釀。現在生產組織的方式改成網絡生產的方式，如後福特主義或豐田主義的生產方式，將組織內的財貨與勞務轉向市場購買，很簡單因為市場所提供的生產要素比組織內便宜。同時人力作為一種資本的專業化過程，也逐漸成熟，許多專業人力在市場上待價而沽。進而許多專業人力不想在一個組織內待一輩子，而是將自己的人力市場化。

社會成本與交易成本的觀念被美國人接受了，基於個人利益的保護，他們當然願意降低社會成本與交易成本。對社會盡一己之力便是降低個人在交易過程的社會成本，我想這個觀念在台灣或許懂，但也僅止於懂。無成本與風險的觀念讓台灣人像財氣勢大的暴發戶，處處慷慨，卻是小氣十足。這種矛盾的心態在九二一大地震的捐贈與救援中，表露無遺。每個人都勇於不計成本投入救災的行列，卻忽略自己與社會的成本，但是平時對於的社會公益，卻是天壤之別。

要怎麼讓中國社會變得具有公共精神一直是近代中國的大事，從太平天國到中國大革命，中國共產黨建國與文化大革命，在台灣的民主改革運動，都是在追求這個理想。這一路子很辛苦，

付出很大的代價，卻成就的很少。

近代社會學家馬克思與無政府主義者普魯東都很強調勞動的社會意義，中國共產黨接受這個觀念，將勞動神聖化，極力推崇勞動改革，在台灣也將勞動改革軍事化，這一輩老老小小的男人幾乎都當過兵。國共兩黨都想透過勞動來重建國家精神與公共精神，記得老總統蔣中正先生過世時，我才小學四年級，讓我印象深刻之處就是好久未能看電視，再者就是成千上萬民眾的夾道送殯。這種神性魅力的集體並非公共性的表徵，好比當年毛澤東在天安門校閱一百萬紅衛兵的氣勢是一樣的。不論是中國還是台灣，這種集體性的表徵，除了在巨星的演會上是不能再出現了。現在台灣與中國不約而同地發展個人主義，並試圖轉向法治國家，公共性與個人權利的問題，不斷在中國近代社會重演。

透過勞動成就公共性並體現個人存在價值的作法，現在的社會亂象證明它是失敗的。但是早在東海推動勞作制度四十幾年後的台灣各大學，不約而同推行服務教育的意義到底在哪裡？大學生缺乏公共觀念是這些制度推動的共同基礎，這與當年革命與理由是一樣的，有沒有新的意義呢？有推行的必要嗎？如果是勢在必行，它的理論基礎為何？或許不需任何理論基礎，但是社會本身的轉換能成就這些推動嗎？我們又從中寄望些甚麼？

過去的集體性是不容許個人主義，現在公共性的培養卻是正要建立個人主義的基礎之上。現在大學生對於個人權利請求的事實不必多談，從對於老師與同學性騷擾的控訴，到學費的爭議，都證明它的發展。記得小學的時候甚至中學的時候，有些老師就在教室內一邊抽煙一邊上課，我念博士班一年級的時候，在有些課堂上也可以和老師一起吞雲吐霧討論課業，當然現在都不

能在發生了（有時候還很懷念）。上課的教室變成公共領域，那是學生與老師匯集而成的場所，在那裡個人權利正活躍著。這種意義與老師權威充斥的教室所展現的集體性是不一樣的。簡言之，當自我存在正與社會存在分開時，權利與義務也區分開來了，並作為區分的標準，同時自我的存在是建立在與社會存在相互穿透的基礎上。

這種個人主義與權利請求的高漲正是當前服務教育的基礎，服務教育的目的不是要犧牲小我就成大我，壓根兒沒有壓抑個人的意義，反而是要更進一步成就個人主義的存在。記得現在台灣的企業組織大概除了科學園區的工程師外，所有的員工下完班便馬上回家，很少人在辦公室逗留或主動加班。大陸有位學者在東京大學法學院作訪問研究時，發現他在的日本留學的指導教授是早上十點到學校研究室作研究，晚上十點才回家。我聽了以後壓力十足，不過更羨慕那位日本教授不必做家事。可以如此醉心於學術與學校的工作。台灣的年輕教授下完班，如果被稱為有家庭責任感，大概是下完班後便是回家帶小孩。在台灣社會雙薪的小家庭正興盛著，同時家庭與工作的地點離得不近，將工作與家庭切分得很清楚，這點是像日本，但是兩性的分工卻不像日本，作為一位台灣的現代男性與女性要分別學會將工作場所與家庭生活切離得很清楚。日本是由兩性分工的切離，來成就以男性為主的公共生活，他們的女性通常結婚後就不工作了。有時我在想如果學校可以提供某些福利也涵蓋於我的家庭，我想我也可以工作到九點甚至十點才回家，當然這個家就在校園內或是附近，否則我就心一狠做個沒有家庭觀念只有工作的男人，不過我的家大概也危在旦夕。

個人主義的興起伴隨工作與家庭生活的切離，並沒有替台灣社會創造出公共性，反而讓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切離得乾乾淨淨，個人更個人主義，而公共性則成爲一種負擔，任何過多的社會服務都叫家庭吃不消。在這種困境中我們要藉由服務教育發展出公共性，是很困難的。

我的家住在東海大學附近，有幾回我想搬到學校附近，可以讓我更投入學校的工作生活。不過小孩照顧的問題例如保母與就學的問題都讓我停滯不前。學校要老師成爲一家人，讓學校成爲大家一起打拼的地方，必須讓所有的老師真正感覺到他的權利受到重視，這是一個他必須愛惜的地方。現代公共性建立的基礎是個人的權利，我們不必太強調犧牲小我就成大我的意義，任何一個過份崇高的口號都叫個人太沈重。

服務教育在走回勞作（動）教育的傳統是可以的，但是必須在本質上有所轉變。以前的古羅馬社會是不強調勞動的，甚至推崇懶散，像日本那種透過勞動的勤勞主義的社會自我存在價值，也不是天經地義之事。在技術與勞動上體現存在價值，日本人是執行得最徹底。日本人在技術上的體現本身便有集體性的性格，雖然台灣被日本統治過，但是要學會那種透過技術，來體現社會自我存在的價值並不容易。日本是一個家庭的社會，家庭與國家之間的統一與區別過程，成功地被轉化成家庭與企業組織，或是家庭與社區的關係。在台灣這一切得區分都只是形式上的區分，結果造成員工對組織的向心力不強，大地震發生了，也不懂得運用社區組織來自我重建，只見一個一個的家在那裡請領他們的救濟金。

作爲一位社會學家，本身都有一部分社會實踐的精神，當年我

到學校面試時，有位老師問到我是否會搞社會運動，我簡單回答不會。但是那種社會實踐的精神是任何一位社會學家所不可少之事。就好比一位醫生如失去懸壺濟世的精神，看病也就僅僅在於賺錢，過些日子也就待不慣那種繁重的診斷工作，移民與置產變成最大的生活目標。當校長與學務長有意設立服務教育組時，我便有意接下這個工作，準備作一番社會實踐的事業，但是人浮於事，凡事不敢多求，幸虧前學務長王慶福老師的推薦，得成此事。我寫了這篇淺談服務教育的政治經濟學，只是一篇草稿，我凸顯許多問題，正反應這份差事的實踐與理想，所面臨的問題與要突破而有所發展的策略，正考驗著所有推動這項社會工程的參與者。

傳統的素樸馬克斯主義認爲中山醫學院要成爲一個家，更變成社區的一分子，這是一個十分值得努力之事。但是作爲一個大學的學生與老師應該不只是實驗室的工作者，否則就跟白老鼠沒兩樣，都只是被工作異化，失去勞動的意義與自我存在的價值了。這是傳統馬克斯主義的論點，現代社會學家對於勞動的意義存入許多功利主義與自由主義的觀念，認爲現代社會的個人主義不能透過勞動而抹滅，勞動是體現個人的存在價值，社會存在的價值是在個人存在價值體現中浮現出來的。因此，中山醫學院作爲一個家庭，一方面個人的勞動要個人主義化，要權利化，但是也要透過學校作爲一種權利系統，與師生的日常生活結合爲一。簡言之，權利系統與日常生活的世界要合一。我想這也是當前大學服務教育最根本的哲學基礎。